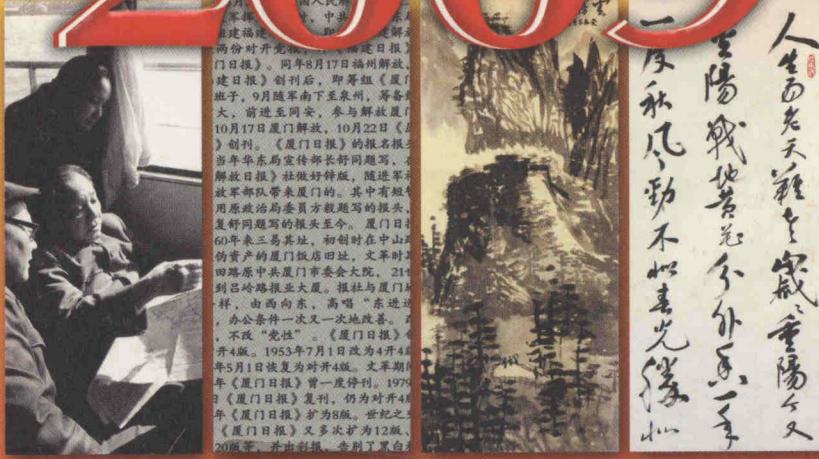


我们约定永远

厦门日报社老员工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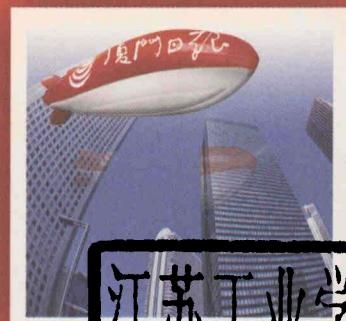
1949
2009



厦门日报

厦门日报·创刊纪念
1949.11.22—2009.11.22





我们约定永远

厦门日报社老员工作品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2901

厦门日报社

披着新中国成立的缤纷礼花，
裹着厦门岛解放的战火硝烟，
厦门日报开始了生命的精彩。
六十载风雨兼程，
我们与厦门一起成长，
我们与读者永远同心；
六十年波澜起伏，
我们忠诚记录历史，
我们正确引领舆情。
时代在召唤，使命在激励，
我们矢志不渝，我们阔步向前：
办海峽西岸最好的主流大报。



阔步迈向
60
厦门日报 创刊纪念 1949.1.22—2009.1.22 年



XIAMEN DAILY
纪念《厦门日报》创刊60周年
1949_2009

编委会

主任委员：李泉佃

委员：谭邦君 朱家麟 江曙曜 魏振宗

主编：江曙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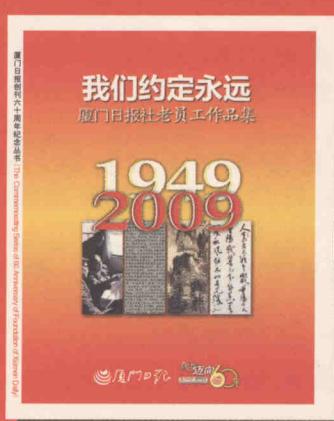
执行主编：关建民 张蕙

编务：柯长怡 曾国水 冯彬 胡素珍

樊亮轩 林婧 向雯

图片翻拍：林世泽 洪蔚尼

设计：陈曦 刘茜茹





“上了船，就是一生”

——写在《厦门日报社老员工作品集》出版之际

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厦门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 李泉佃

或许到了我这种年龄，对“薪火相传”的理解会更透彻些。

四十岁那年，我到了厦门日报社。那时，有时写文章，或更准确地说，有时闲来无事，常常会想，人生什么阶段最幸福？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儿童和老人。道理很简单，因为儿童，用童眼看未来，一切尽在憧憬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而老人，用睿眼回望过往，碎片似的历史细节有时可以串成一部书，这部书足以让后人高山仰止。而四十来岁，则只有埋头拉车，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责任的担当，再沉重，也得承受。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离老人的行列，是越来越近了。这时候，“薪火相传”这个词，突然变得如此亲近，如此鲜活。

“上了船，就是一生。”

这是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的一句话。

龙应台说的是，国民党撤离大陆，上了船，到了台湾，许多人从此一生动荡，万里飘零，叶落他乡。

我引用龙应台这句话，无关政治，而有关职业。

序

今年是厦门日报创刊60周年。60年来，许许多多的厦门日报人，选择党的新闻事业，作为自己的终生依托，则是无怨无悔，无尚荣光的。

尤其是，当他们用笔，用镜头，去回顾走过的岁月，去抒发情感的诗篇，去拍摄曾经的愿景时，历史的原声，就变得如此清晰：有铁马呼啸雄关的悲壮，有边塞琴断残月的忧伤，有如梦如幻美妙的回首，有瑰丽华章礼赞的青春……

这一切，将永远定格在厦门日报60年的历史上。

我曾经说过，我们在职时，在位时，对年事已高，离休或退休的老同志，要以“礼”父母的心境“礼”他们。这种“礼”，不应只是形式的，或语言的，更应是实质的，行动的。因为，我们也会等到他人“礼”我们的一天，且那一天，往往是“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说不准，一眨眼，就到了跟前。

“上了船，就是一生”。

一生，难免有兴衰，有枯荣，有得失；但一生，有许多事情不能简单地以得失来衡量。得到的，固然是好事；失去的，也未必是坏事。它或许在物质上或自己所向往的利益上缺失了，但往往在精神上得到磨炼，甚至会在人格上得到升华。

因而，我深信，有了这种认知，无论是老员工，抑或新员工，都将继续高举厦门日报这面永不褪色的旗帜，薪火相传，为了下一个60年站得更稳、更高、更好！

■ 回忆录

方汉生：我们是被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第一个“解放战士”——	002
郭建尧：彩报出版琐记	004
方振煜：在厦门日报工作的点滴回忆	006
颜志强：从“开学第一课”说开去	008
华亿杂忆琐记	012
郭永桴：学电脑的故事	014
吴奕纯：办公室的变迁	016
李开聪：回忆摄影采访中二、三事	020
林沙：厦门日报60年变迁	024
萧朝：走群众路线办好党报	026
魏永乐：十六年前我到澳门采访	028
洪泓：厦门说桥	030
蔡显文：厦门日报社的第一套电脑	033
万宏生：忆苏来成师傅	034
郑励德：厦门日报自办发行片段回忆	035
陈厚文：从手工排字到激光照排	038
林华山/蔡显文：我们见证了厦门日报的技术革新	040
郭振煌：高歌时代奏辉煌	043
王者诚：我为我的祖国放声歌唱	044
鲍周义：浪淘沙	045

■书画集

陈逸心（书法）	048
洪 涛（书法）	050
·郑励德（书法）	052
游全章（书法）	056
王 仪（书法）	060
洪 泓（书法）	062
王 仪（国画）	064
陈淑凤（国画）	068
杨锡乐（国画）	072
王者诚（国画）	074
江曙曜（国画·特邀参展）	076

■摄影集

李开聪	082
林世泽	086
洪 涛	088
陈笑琴	090
林 沙	092
傅维炳	096
颜志强	098
吴金华	100
萧 朝	104
郭建尧	106

■回忆录

方汉生：我们是被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第一个“解放战士”	002
郭建尧：彩报出版琐记	004
方振煌：在厦门日报工作的点滴回忆	006
颜志强：从开学第一课说开去	008
华亿杂忆琐记	012
郭永梓：学电脑的故事	014
吴奕纯：办公室的变迁	016
李开聪：回忆摄影采访中二、三事	020
林沙：厦门日报60年变迁	024
萧朝：走群众路线办好党报	026
魏永乐：十六年前我到澳门采访	028
洪泓：厦门说桥	030
蔡显文：厦门日报社的第一套电脑	033
万宏生：忆苏来成师傅	034
郑励德：厦门日报自办发行片段回忆	035
陈厚文：从手工排字到激光照排	038
林华山/蔡显文：我们见证了厦门日报的技术革新	040
郭振煌：高歌时代奏辉煌	043
王者诚：我为我的祖国放声歌唱	044
鲍周义：浪淘沙	045



方汉生

1932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汉口市，1949年7月参加中共闽中游击队，1979年3月任厦门日报社副总编辑，1980年至1994年1月任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厦门日报社总编辑，1994年1月离休。

我们是被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第一个“解放战士”

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根本上突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一股强大的政治思想解放的力量，震撼着那时社会沉闷的空气。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不到半年，1979年5月《厦门日报》复刊了，厦门市委调我来《厦门日报》任副总编辑。在夜班编辑室，每天都看到新华社电讯和记者同志采写的稿子，犹如清新的春风吹拂着我，我感受到国家社会跳动的脉搏。“春江水暖鸭先知”，我和报社的同志们都意识到一个新时期的春天来到了。

记者赵连溪同志送来他采写的报道个体户扁食嫂的稿子。扁食嫂在大元路开的扁食店，生意兴隆。她做扁食很讲究，馅肉都是选用猪的后腿肉，扁食皮又薄又嫩，汤用的是大骨汤，吃起来味道特别好，就连家住在鼓浪屿的市民都特地过渡赶过来吃。赵连溪同志认为扁食嫂展现了个体经济的活力，可以用之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就以生动自然的文风写了这篇报道。我立即被这篇报道吸引了，决定发在一版显著位置，夜班编辑做了标题《“扁食嫂”的扁食质佳味美》、肩题《三十余载

好手艺，远近闻名不虚传》。

这篇报道见报后，当天就有一位退休的新闻工作者打电话到编辑部，称赞这篇稿子有新闻价值，文笔清新，希望《厦门日报》多登这样的稿件。接着我们不断收到称赞这篇稿件的回应。但同时，我们也听到不少反对的声音。思明区委宣传科的同志对我说，许多街道干部不满意《厦门日报》宣传个体户。一篇读者来信，反映了商业部门一些干部的不满，说《厦门日报》是“长个体户的威风，灭国营企业的志气”，是鼓励个体户搞垮国营商店，还反映一些国营企业职工吃大锅饭的思想。我觉得国营企业人员有种怕竞争的思想，国营商店怕个体户竞争，说怪也不怪。说怪呢，堂堂国营怕被个体户搞垮，如果在竞争中被搞垮了，那还有什么优越性呢？活该！说不怪，那是因为独家经营惯了，官商作风，吃大锅饭思想严重。这就是社会主义企业不应该有的。我提起笔来，给《厦门日报》“今日谈”栏目写了一篇短评：《怕竞争是毫无道理的》，首先解释党关于鼓励个体商业户的政策，“个体户分布广，方便群众，弥补了国营商业网的不足，他们薄利多销，服务态度好，那优点也是这实实在在的，因而要给以适当的扶持。这有什么可怕呢？”进一步指出怕竞争是毫无道理的，“如果在竞争中，国营集体商店被个体抢了生意，究其原因，不外是吃大锅饭思想，官商作风严重。这种思想作风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竞争，能够帮助这样的企业去掉这些不好的东西，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竞争，还能鼓励先进，淘汰落后，使先进更先进，后进变先进。”“扁食嫂之争”后来出现了喜剧性的结果，不少国营小吃店，也开始用大骨汤作扁食的汤底，并且推出了种种吸引顾客的举措。

那时，另一篇通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也引起社会很大反响。厦门烟厂与美国雷诺士烟草公司联合建立骆驼牌香烟的生产车间，这种中外合作的生产方式，遭到不少人责备，甚至说这是“卖国主义的行为”。《厦门日报》记者庄稼夫进行深入采访，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这种中外合作方式引进了外国香烟的生产技术，给厦门烟厂注入一股强大的活力。因此写了一篇通讯，称烟厂董事长刘维灿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就是这样一篇篇报道，引起社会人们一次次讨论，推动着厦门经济特区初期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

现在回顾厦门经济特区的历史，中央要厦门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就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这个高度来看，上述《厦门日报》的两篇报道，就很有典型意义，它们分别从个体经济和引进外资两个方面，突破了公有制“大统一”的僵化思想，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构架了市场经济的多种要素，厦门经济特区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去年，福建省电视台的记者向我专访，多次问我，你们发表这两篇报道，在当时那样严重的思想障碍面前，你们有顾虑吗，有胆怯吗，你们是怎样冲破阻力的？其实，那时我们新闻工作者是被“三中全会”政治思想解放的第一个“解放军战士”，是思想解放的直接受益者，因此，我们并没有感觉有什么阻力，不存在什么顾虑。相反，我们有“三中全会”赋予我们的思想和勇气。1980年代，我们在深田路厦门日报大楼屋顶，树起鲜亮的霓虹灯，那红光闪闪的八个大字，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郭建尧

彩报出版琐记

1995年，《沈阳日报》与《厦门日报》在中国报界领先天天出版彩报。之前，本报在全国较早结束了用手工铅字排版的历史，告别铅与火的岁月，进入光与电的时代。接着新添进口先进印刷设备，尝试印制彩色报纸。由于条件的限制，先在副刊或在周末出版彩报。

时不待人。1994年年底，由厦门市领导率领的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天天送到代表手里的是五彩缤纷的报纸。随后新加坡代表团回访厦门，市委下达指令：送到贵宾面前的《厦门日报》必须是彩报。

厦门日报编辑部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准备。首先购置先进印刷设备，印制技术部分由总编室负责，新闻采编部分由新闻部负责，广告经营部分由广告部负责，社长亲自挂帅，总编室主任具体负责。为了确保顺利出版，还专门成立了彩报出版领导小组，由社长任组长，总编室主任任副组长，成员包括总编室、新闻部、广告部、生产部等部门负责人。

1936年出生于厦门鼓浪屿。1979年任厦门日报记者、编辑，1985年起任副总编辑，后兼任党委副书记。1996年退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此是机遇，也是挑战。接连多日出版彩报，头版的要闻照片发稿迟，须在最短时间分色制版，困难多多。工厂长蔡显文带领职工日夜奋战，照排、制版、印刷等工序密切配合，分秒必争，终于很好完成出版彩报的任务。这是一次练兵，为彩报出版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接着，《厦门日报》又面临新的挑战。经香港中新社牵线，《金门日报》总编辑来访，商谈和本报建立友好报社事宜，约定互相交换报纸。过后，对方如约寄赠半年报纸，本报却不敢贸然寄

报。为何？人家头版天天彩报，老面孔的《厦门日报》怎好送寄海峡彼岸，这实在有损厦门特区形象啊！为此，我们坐立不安。

多年来，报社不断增加照排和印刷设备，不断探索印制彩报的技术，为天天出版彩报创造条件。要天天出彩报，最大的困难是，大部分国产纸印制不了彩报，需花巨资进口纸张。当时《深圳日报》和《海南日报》进口纸张都享受免税待遇，如果厦门海关也特批厦门日报免税进口纸张，我们就有能力购买，解决天天出版彩报的用纸问题。

1995年上半年的一个星期天，厦门市市委书记来本报调研，我们如实反映出版彩报的紧迫性，要求给予本报免税进口纸张的优惠。市委领导当场表示：同意报社的意见，出版彩报迫在眉睫，必须抓紧进行。2天后，市委书记在厦门日报申请免税进口纸张的报告上批示，责成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杜明聪找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商洽。我曾经是杨关长的中学老师，杜部长要我陪同。我们当即来到厦门海关，杨关长看了市委的批示，听取我们的汇报后，中规中矩地说：新闻纸张进口决不能免税，厦门不能像深圳和海南那样特批，不讲情面地拒绝厦门日报的要求。出乎意料，这位如此严格把守关口的关长，不久竟被美女金钱的糖衣炮弹所击中，在“远华”事件中落马。

出版彩报是当务之急。报社党委一班人全力给予支持，决心全税进口新闻纸。当时，报社广告收入激增，每年有2000多万纯利润，本可以多发奖金，改善办公条件。报社正副总编宁愿挤在一间10平方的小屋办公，与全体职工同甘共苦，把大量资金用在购买机器设备和进口纸张。

我们还想方设法选用部份优质国产纸张。一天上午10时，得悉中国报协领导到广州出差。我和蔡显文当天中午立即赶往广州，要报协领导引荐，拜访广州造纸厂厂长。该厂生产的部份新闻纸质量上乘，可以取代进口纸印制彩报，很抢手。《厦门日报》长期由南平造纸厂供纸，和广州厂家全无联系，要拿到一吨纸都难。我们印制彩报的决心和行动，深深打动中国报协与广州造纸厂领导，我们终于得到优质纸的供应。后来，南平纸厂也生产优质纸张。印制彩报的困难迎刃而解了。

1995年7月1日起，印制精美的《厦门日报》彩色报纸天天送到厦门市民手里，发往全国各地，带到海峡彼岸…

彩报飘香千万里，全国报社同仁纷纷前来学习取经。

1995年11月，中国报协在厦门举办全国彩报出版研讨会，会议事务交由厦门日报操办。中国报界包括《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社都派员参加，近200位会议代表聚集在鼓浪屿观海园度假村，相互交流研讨，本报代表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两院院士中国当代毕昇王选教授专程前来赴会，做了专题学术报告。会议期间，代表们光临厦门日报社，兴致勃勃参观本报照排和印刷车间，并给予很好的评价。

时过境迁。进入新世纪后，厦门日报建造了印务中心，引进更加先进的设备，报纸的印制出版再创辉煌。上世纪末，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厦门日报这座大厦添了一块砖瓦，不足挂齿，且已经是过眼烟云的事了。



方振煜

于1979年5月被调到厦门日报社工作，当过记者、编辑。1988年9月起任厦门日报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2000年12月退休。

在厦门日报工作的点滴回忆

报到第一天就埋头编稿

我于1979年5月被调到厦门日报社编辑部，在经济部工交组当编辑。5月15日，即在厦门日报正式复刊的第十五天上午，我到报社报到。走出办公室，正好遇上经济部主任林严心。他说：“你来的正好，有篇急稿你来处理吧！”我说还有些事要去市人事局一趟。他说，稿件急着用，处理好了你再走吧！我跟他回到经济部，接过稿件一看，这是一篇记者采写的，反映我轻纺工业发展形势的报道，显然是篇重点稿件，看样子当天要下稿的。我二话没说，埋头来认真阅读、修改，并请来了采写这一稿件的记者，补充了必要的材料。花了近半天的时间，编好了稿件，送到主任手里，这才离开。复刊后的厦门日报，人员如此紧缺，是我想不到的。

据了解，省委批准厦门日报复刊后，省编制委员会批准厦门日报的编制是155人（其中干部、编辑、记者等90人，工人65人）。到1979年5月，厦

门日报复刊时，经过努力和各方支持，一共才调到110人，编辑部人员缺额较大。难怪复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编辑、记者整天都忙，星期天也很少休息。我在经济部当编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忙到七、八点才回家。而把稿件带回家，连夜处理，更是“家常便饭”。忙是忙，累是累，大家还是很乐意的。目的是要争口气：停刊九年，现在复刊了，一定要把厦门日报办好！

为新闻纸而奔忙

报纸天一咄，新闻纸是断断缺不了的。但是，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新闻纸是按计划供应的。像厦门日报这样的市级新闻单位，主管部门——省轻工业厅下达的计划指标是很少的。报社要经常派人四处奔波，“找米下锅”。我也曾有过这样一次经历。

大概是1987年4、5月间的一天，副总编胡立新找我谈话。他说：报社新闻纸库存不多，如果不搞一些，就有“断炊”的危险！他希望我找王建双书记反映情况，看看省轻工厅能不能在计划内支持一点。

时任厦门市市委书记的王建双同志，在省轻工厅工作期间，曾抓过宣传报道。我在省报当记者，跑轻工系统，常与他联系，算是比较熟悉。胡总交给了任务，作为总编助理，我自然要去完成。那时，王建双书记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知道这一消息后，我和经营管理部的许建平、厂部材料科的许文村等人，立即驱车奔向榕城。抵达省委党校已是黄昏时分，正下着下雨。此刻党校学员都吃饭去了，我们就在王书记住的4号号楼前等候。不久，就看到王书记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提着热水瓶慢慢走来。我们迎了上去打招呼，并同他一道走进他的房间。书记问了来意，我急忙递上请求省轻工厅帮助解决新闻纸短缺的报告，并汇报了厦门日报出版发行、新闻纸用量以及目前库存等情况，说明要是搞不到新闻纸，党报说有“断炊”的危险。王书记听后，严肃地说这事应当找市政府，不就找他。王书记说得是对的，此事理当先向市政府有关部门打报告，然后由他们向省轻工厅反映。但要等多久啊！大家“心知肚明”：“王书记曾任省轻工厅厅长，同现任的省厅领导也很熟悉，希望他能帮助报社解决燃眉之急。这也是报社领导要我的原因。我只好向王书记交底，如实说了。王书记说：你真不应该来！后来王书记还是在报告上签了意见，但他说能不能解决问题‘那还不一定’。”

真让王书记说中了。当第二天我们到省轻工厅，找到领导送上报告的时候，省厅领导再三表示，实在无法在计划指标内解决新闻纸问题。我们只得跑到党校，再次向王书记汇报，希望王书记能找一下省厅领导，说明情况。后来，当我们第二次找省厅领导时，得到回答是：希望南平造纸厂能予以支持。于是，我们从福州出发，经闽清、尤溪、古田，直奔南平，一路风尘仆仆赶到造纸厂。常与纸厂打交道的许建平、许文村连夜做工作。可能有了好的结果，第二天，我们就离开南平回到福州，第三天返回厦门。

若干年后，在和时任总编辑室主任的洪诗鸿，谈起新闻纸的问题时，他说他也曾为新闻纸奔

波过一阵，由此还结识了南平市多种经营办公室负责人，并成了朋友。可见，当年为新闻纸操心的又何止一人。

参与厦门日报扩版工作

在改革开放和特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扩大新闻报道面、加大经济报道分量与厦门日报版面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早在1991年3月，报社党组织就向市委送了报告，请求批准在1992年元旦厦门日报从对开4版扩为对开8版。1992年7月又向市委送了厦门日报扩版和创办厦门晚报报告。这年12月市委常委召开会议，听取了报社党组的汇报，讨论批准了厦门日报扩版和筹办晚报，要求报社抓紧进行。

因为一年一度的报刊征订时期已过，厦门日报的订户中，私人订户占67%且多是整年订户，不可能因扩版重新向订户收费，因此定为10月1日扩版。厦门晚报则初定1994年元旦创刊。

报社党组作了分工，在总编辑方汉生领导下，由我抓一个组研究制定《〈厦门日报〉扩版实施方案》。1993年2月，由我牵头，廖松荣、鲍周义、林沙、林水圳等人参加的扩版筹备小组，开始了扩版的版面设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研究工作，为制订扩版实施方案打基础。与此同进，报社党组还组织了4场编辑、记者座谈讨论，广征意见。随后，筹备组又前往汕头、福州、南京向兄弟报纸考察学习，经过分析研究，筹备组提出了《〈厦门日报〉扩版实施方案》再交编辑、记者讨论修改。5月19日报社党组通过《方案》，正式上报市委宣传部。

《方案》提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大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报道分量。确立了宣传报道要立足厦门，辐射“三角”，面向全国的观念。辐射“三角”，和一个是以厦门为龙头的闽浙赣南地区；第二个三角是厦门——上海——广州；第三个三角是厦门——台湾——港澳。同时报纸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要反映特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努力为特区精神文明服务。据此，扩版后的《厦门日报》共设计了27个专版4个专栏，明显加大了经济报道的分量，扩大了报道的辐射面。同时为吸纳广告创造条件。



颜智强

1945年7月生于厦门，1979年进入厦门日报社，历任记者、副主编、部门主任，1995年任厦门商报社总编辑，1999年任厦门日报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高级记者，2004年兼任厦门华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6年退休。

从“开学第一课”说开去 ——记者生涯点滴谈

外孙今年上小学，开学第一天回到家，稚气的脸庞带有几分认真：“爷爷，老师通知要看中央电视台第2频道‘开学第一课’，一定要看哦。”18时30分，孙子专注地坐在电视机前。整整两个小时，我自始至终陪着他上完“开学第一课”。这档节目以“我爱你中国”为主线，分成“爱是分享”、“爱是承担”、“爱是力量”、“爱是荣耀”四个章节，形式新颖，生动活泼，时而令人振奋，时而催人泪下，时而发人深省。看到感人肺腑之处，我潸然泪下，孙子也在一旁

用小手擦拭着泪水。对孩子来说，这是多么好的开学第一课，而对成年人包括我，也是受益匪浅的人生一课。

1979年厦门日报复刊，那年我34岁，“半路出家”到《厦门日报》当记者，后来虽然任主任、副总编辑，但是也没有脱离过记者工作。如果要谈点当记者的感受，我觉得，“开学第一课”里的“分享”、“承担”、“力量”和“荣耀”，就是对记者生涯最佳的概括和升华！

先说说记者的工作是一种分享。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重要事实的报道。记者是新闻的见证者、记录者，同时又是新闻的传播者。传播，说白了，就是将你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思告诉尽可能多的受众，与他们分享。在分享的过程中，你也会得到从事这项职业的快乐！

1985年年初，厦门经济特区刚刚扩大到全岛，许多地方相中厦门这块热土，争先恐后前来兴办企业。一时间公司林立，大街上“总经理”一抓一大把。3月初的一天，我去鼓浪屿采访一家5天前才开业的公司，可是跑遍全岛却“踏破铁鞋无觅处”。带着这个问题，我于次日上午走访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得知类似无场所、无资金、无人员、无经营活动的空壳公司并不在少数，一位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提出了对此类公司有必要进行清理整顿的想法。值得重视的苗头，又有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应该及早让读者知晓，以引起社会的关注。事不宜迟，当天下午，我写了一篇采访札记，标题是《公司，你在哪里？》。文中有典型事例，有统计数字，还有那位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建议。稿件见报后一个月，《新华参考》转载了这篇文章，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大了社会影响力。过了不久，清理整顿“四无公司”在全国展开。那位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对我说，你是披露“四无公司”第一人。我说，你是提出清

理整顿公司第一人。他说，《厦门日报》一发言，方方面面都重视，还是党报的威力大！

其次说说记者的工作是一种承担。

承担什么？就是承担你应有的责任。责任意识源于使命感，一个记者的使命感越强，他的责任意识就越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一种使命，反映人民的呼声也是一种使命。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把新闻比作火。她说，记者是寻火者，哪里有火就扑向哪里，这又是一种使命。记不清是哪位新闻前辈说过，记者是生火待发的火车头，是时代巨轮的瞭望者，这无疑也是一种使命。

1989年的海沧还是一个落后的小镇，隔着一道窄窄的海湾，与特区建设如火如荼的厦门岛形成巨大的反差。但是，海沧具有独特的地理、港口等优势，已经开始受到独具慧眼的台商的青睐，厦门市政府适时将海沧规划成台商投资兴业的重点区域，过了不久就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尽管当时海沧空旷的原野还显得有些沉寂，但密切关注它的发展变化的《厦门日报》记者，已经能够感受到开发建设的大幕即将拉开。党报有责任让海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声名远播，以便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一股强烈的报道欲望在我们的心中涌动。8月间的一天，我和张世谊、谢虹、